

毛泽东如何抓住枢纽 实施军事战略指导

□ 李 明

羽“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这其中的“七十二战”，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没有决定性意义，而垓下一战，就属于第三种情况，立即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这种对整体和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局部，毛泽东称之为“关节”或“枢纽”，并特别强调：“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把握枢纽的具体表现形式

枢纽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是主要战略对手。主要战略对手决定着战略指导的目标和重心，是战略指导首先就要明确的。毛泽东十分注意从整个的政治大形势，来分析和确定主要战略对手。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认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帝国主义

取代国民党反动派成为主要战略对手。在这种大背景下，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更多地强调团结国内各种抗日力量，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他频频给国内各方写信，号召捐弃前嫌共同抗日，在西安事变中，毛泽东力主和平解决，避免抗日力量内耗，从而使我们党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的主要推动者，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民族抗战大业蓬勃兴起，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得到有效化解。

可以是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方向是军队遂行主要战略任务的行动方向，决定着战略指导的聚焦点和用兵的重心，关系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我们曾先后多次调整主要战略方向。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爆发前，我军以东南沿海为主要战略方向，主要战略任务是实现国家完全解放、防止美帝国主义的可能入侵。第二次是朝鲜战争爆发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沿海调整至东北。之后又将主要战略方向改为屏护首都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我国东面的中部地区以及我国“三北”地区。在这5次调整中，毛泽东始终坚持在一定

时期内只能有一个主要战略方向的原则，通过分析国家安全形势，确定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主要作战对象和战略对手是谁、我军主要战略任务是什么，结合敌我军力对比，判断确立主要战略方向，并注意把握主要战略方向和其他战略方向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抓住了战略指导在空间上的枢纽。

可以是主要作战形式。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是以主要作战形式的转换为主要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定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也是全局中的枢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就要抓住游击战这个主要作战形式，用极大精力去解决游击战的战略指导问题，而解决了游击战的战略指导，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就活了。

可以是战争过程中的关键阶段。战争是个连续而有阶段性的过程，而每个阶段在战争全过程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的关键阶段，就是战争各阶段的连接点、转折点，是战争全局转换的枢纽。比如，毛泽东在分析抗日战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时，就明确指出，战略相持才是全战争的枢纽。

可以是战略要地。任何战争都有

必争必保的战略要地，这也是战略指导需要关注的枢纽。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指出，发展重点在宁夏，“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特别重视河南、华中、山东的作用，强调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他又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别山，为我军取得整个南线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切从战场实际出发抓枢纽

一是立足全局抓枢纽。枢纽的意义，只有放在全局中才能显现，因此，要抓准枢纽，必须要放眼全局，从全局出发。辽沈战役时，林彪只看到长春是一座好打的孤城，因此主张先打长春，这样势必形成从北到南一线平推的态势，难以实现中央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的既定战略方针。而毛泽东立足解放战争全局，将联结东北与华北的咽喉锦州作为战役枢纽，此地一克，则东北国民党军

与华北的陆上联系被切断。锦州守将、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被俘后感慨地说：锦州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这根扁担折断了，这一着棋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下不出来的。

二是立足战场形势抓枢纽。战场形势是枢纽之所寄，战争指导者需要熟知战场的敌我对比、天文地理等情况，凭借一双慧眼，找出对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关节处。抗战初期，日军沿同蒲路、平汉线、津浦线大举南攻，毛泽东从战略形势出发，指出：“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因为恒山山脉将山西与河北的日军隔开在两个相对独立的战场，他们即使占领太原也如处瓮中，难有大的作为。如果恒山山脉被打通，东西向的正太路被占领，则华北平原和山西的日军能够合兵一处，“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

三是立足科学预见抓枢纽。毛泽东一贯认为，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如无预见，即无领导。有了预见，对形势的未来发展，心中就有了一定的数，抓枢纽也就有了判断和依据。在分析抗日战争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抗战将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依据这种科学预见，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三个阶段中以相持阶段最为重要。“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这就抓住了抗日战争的枢纽所在。

被誉为“神将”的秦基伟

□ 古琳晖

秦基伟自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投身革命，身经百战，功勋卓著，被誉为“神将”。在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中，秦基伟好学善思、巧谋善断、能征善战，在军事实践队中体现出鲜明的个性和出色的才华，是人民军队光辉形象的生动诠释。

好学善思，敢于创新

秦基伟自认为：“小的时候我是比较顽皮的，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尤其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是其以后在带兵打仗中形成不拘一格、善于创新风格的性格基因。由于幼年识字不多，参加革命后秦基伟深受其苦，遂发奋苦学。淮海战役期间，利用白天因有敌机轰炸、部队不便展开的战斗间隙，在野战工事里读了三遍《孙子兵法》。第一遍解决生字生词，第二遍解意，第三遍悉心揣摩其中的深邃内涵。窥一斑而见全豹，足见秦基伟的学习劲头和钻研精神。部下崔建功曾讲：“十五军进步快，战斗力强，与秦基伟好学密不可分，见谁好就跟谁学。”好学善思，加之其对新鲜事物倍感兴趣，为其在带兵打仗中形成特有的风格打下坚实基础。

1948年在淮海战役攻打小张庄的战斗中，当时部队没有重火器，战场又是无遮无掩的平原，如何对付敌人火力上的优势，跨过漫长的开阔地攻克堡垒，确实成了一道难题。秦基伟集中官兵智慧，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迫近作业，用交通沟抵近敌人，创造了对平原堡垒之敌攻坚战新的战术经验。入朝作战之初，敌人掌握着制空权，经常嚣张地以低空飞行轰炸，对部队行军构成严重威胁。秦基伟创造性地运用积极防御思想，立立现有装备，开创步兵打飞机的先例，取得可喜成绩，使美军飞机再也不敢超低空飞行。在朝鲜战场担任防御作战任务时，秦基伟借鉴友邻部队的经验，强调建设坑道式的防御体系，并指导部队摸索出了“打斜眼、打水眼、空心装药爆破法”和“深打眼、少装药、紧填塞、放群炮、快排烟”等先进施工方法，在上甘岭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秦基伟在总结带兵打仗的经验时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掌握现代化装备，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

员。”这正是他不拘一格、善于创新的带兵打仗风格的生动写照。

处变不惊，巧谋善断

秦基伟一生中遇到过不少危情险情，但他沉着冷静，果敢决策，体现了一名优秀指挥员的过硬素质。秦基伟一生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恶仗，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上甘岭战役。此役，战情瞬息万变，战场波谲云诡，战事扑朔迷离，对指挥员的决断能力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1952年10月，秦基伟率第十五军接替第二十六军在五圣山、西方山一线的防御后，立即作出部署：以第四十四师坚守西方山，以第四十五师坚守五圣山，以第二十九师为预备队。西方山与五圣山是志愿军中部防御的重要战略支撑点，东西并耸，互为唇齿。从地形上来看，五圣山山势险峻，为易守难攻之地，而西方山毗邻地势平坦的平康谷地，为易攻难守之地。从常理上说，敌重点进攻方向应为易攻难守的西方山。

10月14日，战役打响，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却下令对五圣山方向上甘岭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起猛烈进攻，此举颇出秦基伟意料之外。在敌隆隆的炮火声中，他翻来覆去反复琢磨：美军弄出这么大的动静，难道仅仅为了挤占我五圣山前沿两个小高地？如果是大举进攻，他们为什么不把突破口放在西方山，由便于机械化部队运动的平康谷地展开攻击？会不会明修五圣山前沿之栈道，暗度西方山纵深之陈仓？在作战地图经过再三思忖，秦基伟一举识破了对手的阴谋：“如果我们因为上甘岭战事吃紧而动用西方山部队，范弗里特极有可能回马一枪，打我们一个声东击西。”于是下定决心：不管上甘岭打得如何惨烈，第四十四师必须死死钉在西方山！这一决断对于战役的胜利至关重要。随着阵地争夺战的展开，秦基伟又根据敌我态势大胆决断：“我反击成功之后，除主峰基点必守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不利则收。”在阵地被夺去后，“应准备好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则会则创造条件”“我之一切战术手段均不要形成规律，保持战术上的主动”。杨得志对此高度评价：“正确的战术指挥，确保了上甘岭战斗的胜利。”

能征善战，血性十足

秦基伟不仅自身作战勇猛顽强，而且部队也带得血性十足，素以敢打硬仗、能打恶仗著称。

1931年12月，秦基伟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手枪营连长，率部参加黄安城的与敌人搏战。外面打得热火朝天，可手枪营的干部战士却被憋在总指挥部内动弹不得，秦基伟心里急得冒火，手痒痒得出汗。他说：“我们手枪营平时跟着首长，方方面面都比其他部队优越，人家也没有意见。可是打起仗来，你也得优越呀，上面发的一长一短两支枪，可不是为了摆样子好看的，关键时候不见血，那还不如烧火棍。当兵的不打仗，就像母鸡不下蛋！”求战心切、闻战则喜的军人血性跃然而生。徐向前下达将手枪营拉上去的命令后，秦基伟率部猛扑而出，把敌人打得四处溃散。

渡江战役时，秦基伟已是第十五军军长，作为高级指挥员，求战热情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部队。1949年2月下旬，第十五军作为二野渡江先遣军，先期向江边跃进。军党委决定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进军誓师大会，进一步砥砺士气。在这个请缨热潮中，秦基伟接到陈慎言等9名战士用指血按了手印的挑战书，在给他们的应战书中写道：“我决心在渡江进军中兢兢业业，执行上级一切命令指示，努力学习战术，学习政策，做到把队伍指挥好，把政策执行好，保证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要打胜仗，这样来回答你们对我的热望。”军政治部把挑战书和应战书登在《战场报》上，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极大激发了部队的斗志。最终，所属130团和131团率先分别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两面大旗插到了长江南岸。

秦基伟久经沙场，曾感慨：“上甘岭战役是我一生中最为残酷的战役。”此役也最能体现他和所带部队勇猛顽强、富有血性的风格特点。第十五军官兵在秦基伟的指挥下，坚守上甘岭阵地而岿然不动，是“钢少气多”战斗意志和战斗作风的最为有力的诠释。他说：“有如此奋不顾身浴血死战将士，敌人焉有不败之理。”



进军福建的开局之战

□ 李向阳

沿海岛屿，以沿海岛屿为基地。”由此可见，国民党自上至下对防守福州的决心都不坚定，信心也不足。

解放军南下入闽，断敌退路准备会歼福州守敌。

上海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决定以叶飞的第10兵团率所部第28军、第29军、第31军共13万人执行进军福建的任务。1949年6月27日，第10兵团下达进军命令。随后，在苏州、常熟、嘉兴地区进行准备，深入动员常熟，整顿和充实组织，较好地解决了部队中存在的“三怕一不愿”的问题，即“怕爬山，怕语言不通，怕天热”和“不愿离开京沪杭”，树立了进军福建、解放和建设福建的信心和决心。

为了保证进军任务的完成，司令员叶飞于6月初任命第29军参谋长梁光率率领一支400余人的先遣队，先期入闽，侦察情报，筹集粮食，抢修道路。在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先遣队筹集到350万公斤大米、450万公斤柴草以及马料、食盐等物资和药品、生活必需品等；此外，中共中央华东局还抽调了600余名干部和2000多名知识青年随军南下。7月2日，第10兵团开始南下，并于当月底抵达预定地区集结，进行针对性的山地作战训练。

针对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第10兵团于7月下旬召开作战会议，研究了进攻福州的作战方案。鉴于福州守敌想固守而不死守的心态，要歼灭福州地区之敌，首先在于切断其退路。在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后，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决心采取钳形大迂回攻击的战法，首先断其陆、海退路，而后会歼被围之敌。决定以第29军从右翼远程迂回，断敌海上退路，以第31军从左翼迂回，断敌海上退路，以第28军进行正面突击，策应第29军行动，并防敌南北夹击。同时，兵团还预想了敌军撤守外逃的处置方案：若守军撤守外逃，第28军则速占福州，并继续向东追击；倘若守军越闽江南撤，则第29军坚决予以阻击，第28、31军跟踪追击。7月23日，第3野战军批准了第10兵团的决心部署。

三面合围福州，守敌大部被歼。福州战役原定于8月15日发起。但8月4日，我军发现守敌开始收缩，有撤退迹象。因此，兵团首长决心提前发起攻击。8月6日开始，第10兵团按预定作战计划，分几路向福州开进，部队经5天急行军，隐蔽逼近福州外国。

8月11日，福州战役打响。右路第29军，首先发起战斗，并于16日切断国民党军南逃之陆路；左路第31军，于16日控制了闽江北岸，封锁了闽江，完成了断敌海上退路之任务；中路第28军，于16日迫近福州市郊。至此，第10兵团从东、西、

北逼近市区，对福州形成了三面合围。福州守敌见福州被围，一时惊慌失措，朱绍良和李延年乘飞机仓皇逃往台湾，把防守福州的任务交给中将副军长李以助和兵团参谋长何同棠。

8月16日，总攻福州开始。李以助、何同棠立即带着驻守福州的四五千人向福清方向逃窜，迅速被我第29军包围。李以助、何同棠等人开会决定投降，并派一名中校副团长带着李以助亲笔签名的名片到我第29军85师指挥所，说：“我们是来投降的。”85师师长来云谦告诉他们：“你们无条件一律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久，李以助、何同棠下令投降，投降的4700多人中有少将以上军官9人。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发现缺少了第25军的中将军长，又派出部队搜索，后在一个山沟里被我军俘虏。

17日晨，第28、第31军各一部进入福州城，福州解放。随后，第10兵团除以一部兵力警备福州外，主力分路追堵逃敌，前锋团迅速推进至万寿桥。万寿桥是福州市区通向闽江南岸的唯一陆上通道。因此，双方对万寿桥的争夺相当激烈，万寿桥战斗成为福州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为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追击，掩护其主力撤退，国民党军在万寿桥部署了一个团，在桥的中央建了一个碉堡，以猛烈的火力交叉网封锁桥面，并以大桥南面山上的迫击炮不断袭击江面和桥面，形成了坚固的火力墙。解放军前锋团冲到万寿桥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密集的火力的射击，伤亡10余人，进攻受阻。该团政委孙乐陶命令3营副营长魏景利组织几十人的突击队强行攻击，魏景利胸部中弹，仍用手捂住伤口继续指挥作战。但由于敌军火力十分猛烈，我军突击队一度被压在大桥上无法前进。危急关头，桥北我军及时组织火力掩护，副排长王克勤首先冲到桥南敌军工事前，手持冲锋枪猛烈扫射并高呼“为副营长报仇”口号，其余队员迅速冲过桥去。

万寿桥战斗后，我军在审问俘虏时，一名投降的国民党士兵向我军报告说，国民党军在我军进攻万寿桥之前，就将两色炸药放在了桥墩上，准备炸桥。我军迅速组织人员进行排查，终于找到这两包炸药，把炸药扔到闽江，炸药在江中爆炸，万寿桥得以幸免。

我军乘胜继续追击。敌除一部逃往平潭岛和漳州、厦门外，其余均被歼。23日，福州战役结束，进军福建第一阶段作战任务胜利完成。

